
World in Turbulence and China:

Towards Building up New Modern Sinology

周 长 城

(ZHOU Changcheng, 武汉大学)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持续发展，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情景下，如何从事国别研究，如何进行当代中国研究，构建当代中国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野，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的地区研究，或者说国别研究，具体地说是中国研究(China-study or Chinese Studies)，存在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一是研究的视野；二是研究的方法。如荷兰学者 H. 凯帕所批评的：“如果令汉学家难堪，最一针见血的方法就是问他（或她）使用什么变数、什么常数、什么参数，以及——也是最重要的一它们之间有着什么联系。”¹ 来自不同学科的中国研究学者缺乏相关沟通的话语系统，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现实和状况将制约中国研究的进一步向深入发展。本文试图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探讨中国研究的新的方法论，主要探讨“新现代化理论”、“新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全球化理论”。

一、新现代化理论研究模式

60年代后期的理论争辩高峰过后的一段时期，现代化理论研究者对其批评者采取冷漠的态度。然而到70年代后期，对现代化学派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兴趣索然，批评大减。现代化研究者也开始认真考虑批评者的意见，修正其理论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经过修正后的这些研究被称为“新现代化研究”。

修正后的“新现代化研究”较之以前“经典的现代化研究”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新现代化研究”抛弃了把传统与现代视为一对排斥性的概念的做法，在“新现代化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不仅可以共存，而且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此外，“新现代化研究”不认为传统对现代化的进程是一种阻力，而认为传统对现代是有益的。换句话说，“新现代化研究”对传统持比较客观的态度。第二，“新现代化研究”者在方法上有所改进。不像“经典的现代化研究”那样，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并把讨论限定在高度抽象的层次上，“新现代化研究”者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新现代化研究者”认为历史常常能说明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发展的特殊范式，研究深入的案例常常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支撑。第三，对历史和具体研究格外关注，所以，“新现代化研究”不作出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这一单向性的假设，相反，“新现代化研究”理所当然地认为第三世界国家能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第四，“新现代化研究”关注外部因素（如国际）对当地现代化的影响。虽然他们仍然着重内部因素的关键原因，但他们不忽略外部因素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中的影响作用。

概括讲来，“新现代化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比“经典现代化研究”有进步，一是“新现代化研究”把传统又带回到现代化研究之中；二是把历史分析引进现代化研究之中；三是“新现代化研究”的方法更复杂、更全面。经过修正后的现代化理论在90年代的研究中更富有生机。

二、新依附理论研究模式

如果说现代化理论是来自欧美研究发展的观点，那么依附理论则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研究发展的的心声，是来自边缘的声音，是对美国现代化学派霸权地位的挑战。

被修正了的依附理论称为“新依附理论”与“古典依附理论”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首先，“新依附理论”所采用的是“历史—结构”方法论，不同于古典依附理论的普遍归纳法。新依附理论以考察历史为基础，在“新依附理论”中，“依附”这一术语并不是作为一种归纳“不发达”的普遍模式的理论，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来分析第三世界的具体情况。“新依附理论”的目标是对依附的特定新情况之不同与多样性作一历史的分析。所以，“新依附理论”所研究的主要课题为：研究者如何才能在一个给定的依附情况下发现其历史性的独特之处？一个特定的依附情况与以前的情况有何不同？一个特定依附情况的历史根源是什么？这种特定依附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发生变化？现存的依附结果自身如何产生转变的可能性？依附情况的一个变化对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有何影响？

其次，和经典依附理论学者那种注重依附外部情况的做法不同，“新依附理论”更倾向于强调依附的内在结构，而对依附的政治方法很感兴趣，尤其对阶级斗争、群体冲突以及政治运动感兴趣。然而，在“新依附理论”对依附内在的政治斗争的作用作出卓有成效的再认识时，设想：“形成了一种复杂整体的内在力量和外在力量的关系，这种整体的结构联系是基于当地的以及外国的统治阶级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同时，这种整体又被当地的被统治阶级和群体所威胁。”例如，外在的统治通过当地的群体和阶级的社会运动而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这些群体和阶级的努力加强了外国的利益，因为他们可以藉此来与人们所假设是固有的那种价值观、利益等相契合。因此，“新依附理论”呼吁对“外在利益国际化”进行分析。

再其次，“新依附理论”将依附作为一种开放的过程，这不同于经典依附理论那种强调依附的结构决定论。在依附的相似结构中，有一系列取决于内在政治联盟和运动的可能反应。所以，如果依附结构划定了摇摆变化的界限，那么政府、阶级、群体的政治斗争能够重视并改变这些结构，甚至可能用一些没有预先决定的结构取代它们。所以，和经典依附理论那种预言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展元明确方向的做法不同，“新依附理论”认为有依附联系的发展是可能的，“发展和依附是存在的，而且以比那种被占领及半殖民的情况更有活力的依附形式存在”。总之，许多经典依附理论的基本假设在卡多佐的研究中被修正，这种方向上的改变在结构理论的研究上开辟了新领地。

三、世界体系理论研究模式

沃勒斯坦认为，人类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它总是形成

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出现“世界性帝国”这样单一的政治性中心，相应的世界性经济则没有出现，或者即使出现也极不稳定。地理大发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以西北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由核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三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国际分工体系中，核心区控制国际市场，利用边缘区提供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主要从事工业品加工制造与出口，控制了体系中的贸易与金融的运转；边缘区则通常将原材料出口到已工业化的核心国以交换其加工制品；半边缘区具有双重身份与效用，在国际势力依附关系中的地位处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相对于边缘区，它部分地充当了核心区的角色，其工业发展水平要高一些，国际政治势力也大一些，但由于其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势力还不很强大，它们仍然从属于核心国的统治，相应地充当了边缘区的角色。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这三种角色缺一不可。三种不同的角色是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的不同区域（我们称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世界体系不断发展变化，核心区也不断地扩大和转移。核心区常常出现霸权国家，但是这些称霸都是短暂的，一个国家的称霸到达顶峰时，它也就开始走下坡路。如荷兰在16世纪成为了霸权国，后由英国取而代之。19世纪末，随着中心区由西欧向北美转移，英国的霸权地位也开始衰落。到20世纪，世界则成了“美国的世纪”但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也出现了某些衰落的征兆。由此英国朝野曾在80年代出现了“英国地位是否衰落”的激烈争论。90年代后，随着苏随意的解体和东欧剧变，关于国际格局的演变在学术界、政界又出现诸多看法，众说纷纭，整个世界体系中是否存在霸权国，是否仍然有核心，也不曾有定论。沃勒斯坦认为，原有的世界体系在20世纪末已进入“混乱的告终”时期。今后50年内世界体系中存在着造成明显不稳定的主要根源，这种明显不稳定是由于财富分配和人口增长方面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而造成的，依靠国内本身的力量难以成功地予以制止。“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这是一幅大动乱的图画，但它并不令人悲观失望。

沃勒斯坦自信新的解决方案一定能够找到，一种更高效、更合理的新的世界体系必将建立。这一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改变分配制度的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系，将引起政治和经济决策层的重新整合。这将构成世界体系的第三种可能形式，即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政府。但沃勒斯坦所指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并不是一种现存的形式。即不是当今世界少数国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这一体系是什么样子，沃勒斯坦自己也难以预测。但可以肯定它肯定会到来。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意志自由”的时代。2050的世界将是一个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今后50年的政治将是对我们世界体系进行改造的政治。

总的来说，“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视点，意在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解释发展与不发展。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化理论就一直在欧美社会科学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它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得到年轻的激

进学者的极大支持。

四、全球化研究模式

近年来，全球化越来越引起各个方面的关注。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员的交往、文化的交流等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人类活动已经不仅仅是区域性，更是全球性。生活在地球不同角落的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休戚相关。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划时代的社会变革。全球化浪潮的迅猛兴起，将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一切方面形成一场席卷全球的世界风暴，并对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将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中国研究与全球化的关系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的转变。

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认为，人类组织为“社会”这样的实体，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框架。不仅如此，人们往往将“社会”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认为民族国家是实行有效社会控制的场所，是社会变迁实际发生的舞台。社会的界限与国家的界限是同一的。或者说，每一个国家之下有一个社会，所谓社会变迁和发展，也就是国家的变迁和发展；各国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改变着自己的生产方式，走向现代化、工业化和都市化；在国界之内，各种因素是内部的，而在国界之外，各种因素是外部的。民族国家社会从逻辑上看是独立的实体，在统计方面可以将它们加以比较。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心照不宣地假定，新独立的国家将开始某种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将经历某些先进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道路。它们“发展”或者说“现代化”的程度，可以量化为一些可以衡量的特征，如富裕程度、教育、职业、识字率和收入等等。通过这些方面的指标，可以对各民族国家进行比较。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无论对发达国家研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都产生了主导性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民族国家分析框架”面临许多问题。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跨国化和全球化。很多迹象表明，全球经济正在侵蚀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经济全球化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的出现建构了物质基础。全球社会出现的标志是市民社会和政治过程的跨国化、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和某种“全球文化”。按这种观点看，国家不再是从外部与一个更广大的体系联系在一起，而是从内部与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形态联系在一起。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描述事物的运动如何在特定系列的历史结构中发生。然而，民族国家本身并不是超历史的，它是生产、社会阶级和领土的特定历史组合。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正在超越这种特定的组合，面对全球化，许多研究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将国家间的互动视为世界社会的主要动态，因而已经走到认知和解释的极限。围绕民族国家形成的概念，无法解释性质上属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现象。全球化要求实现某种认识论上的突破。作为全球化研究的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认识论假定，只有通过当代现实中一系列关系进行理论概括才能形成，这样才能说明现存条件下潜藏的结构和历史运动。当然，这些关系并非不言而喻的。在全球化研究中，这种认识论转换首先意味着国别分析中区分表象（从民族国家分析框架中得出的民族国家性现象）与实质（跨国性、全球性的现象）。我们所看到的民族国家性的现象，可能事实上是跨国性和全球性的，我们

需要从民族国家性的现象中解读出跨国性和全球性的实质。以发展研究为例，传统的发展社会学明确地或不由自主地将发展视为民族国家性的现象。然而，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生产过程分散分布的特征，意味着发生在某个特定国家的实际生产活动并非一种民族国家性的活动。经济全球化显示，跨国资本往往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各种时局考虑，在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中选择最佳区域和时间分布并重新分布其积累过程。跨国资本在特定空间方位找到的比较优势，从本质上看是依暂时条件而定。生产要素的极大流动性和金融资本的决定性作用表明，在一个开放的国度，看似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结局的东西，可能是流动性的跨国资本的一种后果。因此，我们在分析某个国家的发展战略、政策与其发展的结局之间的联系时，需要考虑资本的全球积累过程，这就要求超越民族国家分析框架。全球化所带来的质变是作为社会组织主要形式的民族国家被其他形式取代。这一过程正在进行，但远未完成。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和全世界经济资源向跨国资本集中，其首要后果是：与民族国家的直接权力相比较而言，资本的结构权力大大增强。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动力，其中的关键趋势是跨国资本的地位处于上升状态。而另一方面，尽管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或者说被取代仍需要漫长的时期，但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民族国家体系及其参照系无疑正处于衰退状态。新的跨国空间、全球空间正在侵蚀、取代作为社会生活场所的民族国家空间。社会结构方面的决定性正在由民族国家空间转向跨国空间和全球空间。社会结构的跨国化和全球化这种本体论的转换，显然要求进行某种认识论的转换。

1 www.soas.ac.uk/eacs/issinsum.doc